

解思忠 著

「素质与命运」

《素质与命运》既是一部现身说法的感悟录，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回忆录。作者近年来致力于国民素质问题研究，在完成《国民素质忧思录》、《观念枷锁》和《国民素质读本》“国民素质三部曲”之后，又回顾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、治学道路上的得失成败，并追溯了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，阐发了关于“素质就是命运”的感悟。

作家出版社

1251

75

解思忠 著

「与」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素质与命运/解思忠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1
ISBN 7-5063-2293-5

I. 素… II. 解… III. 解思忠-回忆录 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6082 号

素质与命运

作者: 解思忠

责任编辑: 潘宪立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版式设计: 英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08 千

印张: 10

插图: 3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93-5/I·2277

定价: 17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 言

“素质就是命运”——我于1997年6月5日应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之邀，给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讲课时，首次提出了这个命题；近年来，又以此为题，面对不同听众做过几次演讲。这一命题，不仅是学理推断和实证分析的结论，也是自己半个世纪生涯的感悟——回首往事，所有的得失成败无不与自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“国民素质三部曲”相继出版后，许多读者在来信或谈话中都对书中的现身说法流露出浓厚的兴趣。我想，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全都写出来，实在是没有必要；倒是把自己在求学、治学道路上的得失成败写出来，并追溯一下自身素质上的原因，也许会使关注自身素质、追求自我实现的读者从我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借鉴与启迪。

我少年即钟情于文学，高中毕业前却违心地改考理工；离开学校后，又一直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是绝缘的职业。几十

年来，无论是颠簸奔波于秦岭山区的建筑工地，还是俯仰周旋于机关大楼的文山会海，无论是混迹底层，还是身居高位，我都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与解脱的途径——她不仅使我的心灵里始终洋溢着希望，充满着战胜困难和庸俗的勇气，而且还提升了我的精神，照亮了我的人生。

为了实现自我，几十年来，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与写作之中；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近几十年的生涯就是“读写生涯”——读书使我明白，写作使我充实。

目 录

1	前 言
1	培植儿童的进取心可以使其受益终生
5	轻度贫困是儿童成长的精神钙质
14	过分畏人言会窒息个性
19	先做书呆子
24	理想最好能与先天气质相吻合
30	[附]两篇作文
33	化自卑为自强
38	[附]《少年题壁诗》
41	宽容应从忍让做起
44	刻苦立身
51	实现理想的捷径往往是曲线
56	数学使人理性

- 60 收敛思维会把人引进死胡同
- 65 [附]《二读〈多余的话〉》
- 69 行万里路受益无穷
- 79 卧病使人清醒
- 87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
- 94 [附]《童心》
- 98 人文知识是立身之本
- 110 青春虚度最可惜
- 116 底层生活可以培植平民意识
- 123 敬业是人生的基本训练
- 128 心态是关键
- 134 文章趋时难长久
- 140 人生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前期论证
- 145 将信心建立在外界支持上是一种脆弱心理
- 150 抵御诱惑比战胜挫折更需要意志力
- 156 想超越常人就不能过常人的生活
- 162 小处成全大事
- 168 顾虑重重会痛失良机
- 176 从文学中学习人学
- 186 从宗教中汲取智慧
- 194 为官应以学问立身
- 209 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
- 219 治学贵在创新
- 228 有胆亦应有识

236	治学应有归宿
247	[附]《素质就是命运》
253	不断追问才能步步深入
261	有破亦应有立
268	作家对读者应以诚相待
275	[附]读者来信摘录
305	后 记

培植儿童的进取心可以使其受益终生

我是1952年上学的，那年6岁。按当时的规定，7岁才能上学；之所以提早一年入学，不是家里的意见，也不是学校的意见，而是我自己的要求。

当时，学校设有幼稚班，规定儿童入学前，先得在幼稚班呆一年，以便收收心，培养培养上学习惯。那时的农村没有托儿所、幼儿园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整天在外面野跑，在入学之前实在是需要有一个“圈养”的阶段。

我们村的小学当时设在一个庙里。庙里的神像被搬走了，幼稚班便被安置在原来安放神像的高台子上，下面的殿堂是一年级班。一年级上课时，幼稚班就坐在高台子上看他们上课；一年级下了课，幼稚班才能离开座位去玩耍。

上了一段幼稚班后，我便对母亲讲要上一年级，理由是幼稚班不“念书”。母亲便让三姐给一年级的老师说说。三姐当时也在本村的小学上学，她已是四年级了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三姐拉着我的手向老师请求的情形——

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名叫杜岗，是我们邻村人，高高的

个子，和蔼可亲。

三姐向他说明我的意思后，他弯下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上一年级就得写大字！”——“写大字”，就是用毛笔写大楷。

我回答说：“写就写。”

于是，他就同意了——我从此便走下了“神坛”。

由于我答应了老师写大楷的要求，所以此后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，每张都有许多字被“画圆圈”——老师用红笔在字的右上角画个圆圈，表示写得好。

我提早一年上学，到底对此后的人生道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，就很难说了；但从通常意义上讲，早受教育应该是一件好事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在同年级都是年龄最小的；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大好几岁，初中入学时有的女同学居然已结了婚。

当时在农村，家长普遍不重视孩子的教育；学龄儿童不仅普遍上学晚，而且中途辍学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我能够提出不上幼稚班，直接上一年级，是由于我当时对上学有一种朦胧的好感；而这种好感，则是来自于母亲的教诲。

记得在我刚有点懂事，也就是大约5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开始翻来覆去地对我讲：“世界上只有念书最好，书念到自己肚子里，谁也拿不走；要好好念书，跑到人前头去。”及至上学之后，她依然还是这样教诲我，更多的道理也再讲不出。母亲自己是半文盲，几乎没有教我识过字，更谈不上给我传授学习方法，当时也没有条件让我接受任何学前教育，但她这种反反复复的念叨，却足以使我刻骨铭心。

母亲 1914 年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，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没有能读书，甚至在出嫁前连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，还是父亲给她取了个名字——“董逸情”。母亲结婚后才开始自学识字，如今年近九旬仍经常阅读书报。关于母亲，我曾于 1991 年写过一篇记述她的文章，题为《妈妈》；后应《中华儿女》杂志之约发表，题目被编辑改为《多舛的人生

无限的爱》（此文曾获联合国妇女大会“写给妈妈的话”作家组二等奖等奖项，并收入《名人和他的母亲》、《中国文化名人忆母亲：心中的碑》等丛书之中）。

母亲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子女教育，既与自己从小没有能上学有关，但也与外界的影响有关。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“文化村”，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出过一个翰林院庶吉士，在方圆几十里曾显赫一时，所以，村子里的人普遍重视教育，男性很少有文盲。另外，父亲的求学经历也会对她产生影响——

父亲从小读书刻苦，学业优秀，在本村读小学时，每次都考第一名，有的同学便说这是因为我的祖父是村长，老师偏袒他；于是，父亲便转到离家十多里远的县城去上学，结果，每次仍然是考第一。父亲到太原上中学后，我们这个大家族已开始衰落，祖父身为长兄和家长，为了在兄弟几人面前做个紧缩开支的表率，便让他停学，并不再寄钱。当时，学校一位名叫畅康候的老师得知此事，主动提出要供养父亲上学，这样才使他免于失学。父亲到太原上中学前刚与母亲结婚，由老师供养后一直到毕业都没有回过家；后来他向母亲解释说：我不能让老师供了我学费，再供我回家的路费。

父亲 1933 年初中毕业后，不好意思让老师再继续供养自己，便考取了规定高中学历才能投考的黄埔军校。

母亲鼓励我“要好好念书”也罢，“跑到人前头去”也罢，其实都是在培植我的进取心。一开始，我还是不自觉地要求上学读书；当渐渐意识到受教育的重要性后，就转化为自觉行为。这种启蒙，虽然与那些请家庭教师或自己亲自教授的学前教育相比，成本最低，却使我受益终生。几十年来，无论是在求学时期，还是步入社会，无论是在顺境之中，还是在逆境之中，我之所以能努力进取，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母亲对我的教诲。

轻度贫困是儿童成长的精神钙质

在记忆之中，贫困是我童年的一大苦恼。

我上学后，因家里买不起课本，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用过的旧课本；至于文具，就更是凑合着用了。有一件事情，留给我的印象极深——

那是一个下雨天，雨下得很大，院子里积满了水。

母亲正在屋里做着什么，三姐在一旁央求着要买一支写小楷的毛笔。当时，小学生不仅要写大楷，到二三年级时还得在大楷的字行里加写小楷；所以，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准备两支毛笔，一支粗点的写大楷，一支细点的写小楷。

买一支写小楷的毛笔才能花多少钱呢？然而，母亲就是买不起。

三姐那时也不过就是 10 岁多一点的孩子，看母亲不答应，就一个劲儿地缠磨，终于把母亲的火给点起来了。母亲丢下手中的活计，扬起手来就要打她。

三姐吓得哭喊着直奔屋外，跑到院子中间时滑了一跤，全身扑倒在积水里；爬起来后又一直跑到院子对面的台阶

上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直打哆嗦……

虽然时过半个世纪，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三姐那副可怜的样子就历历在目，三姐那声凄厉的哭喊就在耳际萦绕。

三姐到底都没有能得到一支小楷笔，只好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写小楷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支笔管为深褐色的毛笔。我上学后，这支毛笔便传到了我的手里。

同样的事情又落到了我的头上——学校也像当年要求三姐他们一样，要求我们每人准备大小两支毛笔，并要进行检查。我知道当时家里还是没有钱，一想到三姐当时的情景，就不敢再向母亲提起。

学校终于要检查了！眼看着杜老师从前排一个个地查过来了，我吓得心直跳，缩着身子，低着头，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去。当杜老师走到我面前时，我连忙从凳子上溜下去，站在那里，结结巴巴地把我在脑子里已想过无数遍的理由说了出来：我这支大楷笔也能写小楷。其实，这是一条近乎可笑的理由——哪支大楷笔不能凑合着写小楷呢？杜老师并没有为难我，只是皱了皱眉头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就走过去了。我想，他应该知道，我家在当时我们那个 500 多户人家的村子里是最穷的一家。

早在我一岁多的时候，家庭遭遇变故，就已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——1947 年秋天，我们全家赴西安探望重病卧床的姑母，途中祸不单行，父亲去世，遭土匪抢劫。母亲身在异乡，举目无亲，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姐姐，抱着我，肚子里还怀着即将出生的妹妹，流落在豫西一带；待辗转到西安时，已是一贫如洗，姑母也去世了；全家就依靠母亲和姐姐

为工厂拆洗被子、锁扣眼、糊火柴盒维持生活。就在我们衣食难以为继的时候，当年供养父亲上完初中的那位畅康候老师正好也在西安；他知道我们全家的遭遇后，便慷慨解囊，接济了一笔钱。母亲将这笔钱除了用于安置父亲的灵柩外，其余主要用于供大姐上学。西安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曾给我们救济了面粉、布匹，并将二姐、三姐收进原本是收养孤儿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儿童教养院。

1971年3月，我参加工作后去西安出差时，曾寻访到当年位于东关的故居和房东；回来后，写了一首题为《旧居



● 1946年夏天摄于山西运城市。照片中坐着的是父母，站立着的是三个姐姐，母亲怀抱着的是我，妹妹此时尚未出生。一年之后，随着父亲的去世，全家便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。

赋》的五言诗：

阔别二十载，重入长安游；
步远东门外，寻我旧日居。
人事几更迁，依然一破屋；
抚景伤往事，百感胸中流。
忆昔有吾母，孀居守此庐；
里外手一双，膝下五张口。
合家一床被，常为柴米愁；
更有吾兄妹，嗷嗷尚待乳。
大姊年既长，本可做帮手；
宁劳一人躯，不使荒学术。
转眼北风吹，衣破不胜补；
灯下长叹息，泪眼望儿女。
呜呼昔日事，冉冉付东流；
伤心一席话，百年入肺腑。
徘徊日已西，黄昏起风雨；
慷慨悲歌去，挥笔写此赋。

由于在西安生活难以为继，我们只好于 1950 年返回原籍农村；当时，连炊具碗筷都得借——我至今还记得，在县城工作的舅舅曾给家里送来一口铁锅和一擦碗。大姐本来留在西安上学，由于家里没有钱再供养，便于 1951 年在上高中二年级期间中途辍学，考入公费的北京解放军炮兵技术学校。二姐、三姐后来也被接回来了；尽管家中仍然是非常的

艰难，母亲还是坚持让她们上学。二姐小学毕业后，只好也考入公费的师范学校；1955年毕业参加工作后，便开始照顾家里。正是由于大姐、二姐过早地结束学业，才帮母亲分担起家庭的重担，使得我们下面的三个弟妹得以继续学习。

杜老师当时对我这个贫困家庭孩子的理解和宽容，使我非常感动。从此之后，我写小楷比写大楷更为认真，生怕写不好会对不起杜老师；当时，我写的小楷每次都有许多被“点瓜子”——老师用红笔在字的右边点顿点，形如瓜子，表示写得好。

杜老师除了担任班主任外，还教我们班的语文和美术课，一直将我教到初小毕业。我高小毕业后，就离开了本村；40多年来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1999年杜老师66岁时，家乡的一些同学为他祝了一次寿；事先得知消息后，我与负责筹办的同学联系，准备寄些钱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他知道后，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不要寄钱了，给他写几个字。我除了把钱照寄去外，又写了一个“和善育人”的篆字条幅，并委托筹办人裱好后送给他。2000年9月25日，杜老师随家乡一个旅游团到北京，我前去驻地看望了他。师生分别40余年，相见甚欢。他除了给我带来家乡的红枣外，还赠我一副自撰并手书的对联：上联是“雨露润春苗忆昔学教北牛（“北牛”是我家所在的北牛池村在当地的简称——作者注）同堂合聚师生爱盼愿宏立荣国志”，下联是“风霜移岁序喜今相逢京都握手依稀你我心屈膝畅谈故里情”。

以母亲对我们学业的重视，连学习用的课本和文具都尚且买不起，别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几乎